

献上一束“勿忘我”

——再悼葆耕

○孙殷望（1961电机）

葆耕去世后，《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约我写篇悼念文章。由于截稿时间即且篇幅所限，再加上当时心情悲痛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写毕交稿。悼文《一个永不消逝的紫色背影》发表后，我总觉得意犹未尽。作为和葆耕在中文系共事十年的搭档，对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及内心世界理应了解得更深入一些。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写一篇悼文，从对若干往事和难忘印象的追忆中，概述我对他为人特点的一些认识，也藉此再次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其一，葆耕是一位严于解剖自己、追求心灵纯净的人。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却深刻自省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1971年初，工宣队在全校开展了一场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文革”中一向以伪造炮制假经验著称并红极一时的迟群及其同伙，为了显示斗争的成果，采用先下结论后逼供的卑劣手段，将葆耕打成“五一六分子”，又树为“从宽”的“典型”，在全校大会上亮相。当时，我们政治理论课的绝大多数教师以及对葆耕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传出，葆耕受另一位政治课教师之托，在他因家人生病请假探亲期间，代他参加了几次某“斗私批修”之



清华大学举行的徐葆耕教授追思会现场

类“联络站”的会议，并填了一张介绍自己基本情况的表格。仅凭这张表格，工宣队用“熬鹰”式的24小时不间断的逼供，迫使葆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由此可见，这是一起典型的“逼供信”所造成的冤案，而葆耕实际上又是代人受冤。而且，在这样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宁可自己蒙冤，也不愿揭发别人，算得上是一条汉子！在当时，很多人也并不认为葆耕犯了多大错误，但葆耕自己却对这次的“怯懦”耿耿于怀，不肯自我原谅。直至生命最后几天所写的《告别书》中仍不忘提及，并认为这是“最感到羞耻的”，“每次想起，都为自己的怯懦而愧悔不堪”。

早在十几年前，葆耕在一篇题为《一棵独立不倚的树——略记蒋南翔校长》的

文章中，就对自己被迫“认罪”的这件事，作了较为详细清晰的自我解剖。在此，我引述如下一段文字：

……这件事摧毁了我的人格和生活勇气。我知道，从小崇拜英雄的我，其实是个一文不值的懦夫。惟一支撑我的理由是，这个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抗是不可能的。全国有上百万人都如我一样违心地往自己的脸上抹了黑。

就在那自惭形秽、无颜苟活的日子里，我听到了一个“传达”：蒋南翔在北京卫戍区的监狱里，胆敢在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中央文件上逐条批注，针锋相对地发表不同意见。听“传达”时，蒋南翔那些掷地有声的批注有如一把把尖刀戳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手冰凉，心在颤抖。这是一个囚徒在向雷霆万钧的天神挑战！在当时，我没有能力分辨对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大无畏的冲天正气！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我哭了。当我违心地把罪名戴在自己头上时，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这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运动。我的卑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所崇拜的神。今天，蒋南翔在监狱里发出的声音，把我灵魂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了。我不能不面对自己那丑陋的、一丝不挂的灵魂！我真想跪在上苍面前，让他把我这卑怯的灵魂收走！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发誓：今生今世我已不可能做一个勇敢者，但我绝不再说谎！……

这篇文章我读过多次，每次读完这段文字，总有一种心灵震撼之感。一个人，对在“文革”中被迫犯的一点“错误”，

能如此公开地忏悔，并坦录于白纸黑字之间，公示于社会与历史之上，需要何等的决心和勇气！相比之下，那些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比葆耕又多又大又严重的人，又有几个能像他这样公开忏悔？在如何对待自己错误这一点上，葆耕不但不是“怯懦者”，而是真正的“勇敢者”。通过这件事，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反而增加了对葆耕的几分敬佩。

其二，葆耕是一位关爱同事、多情重义，“待人宽厚，心无芥蒂”的人。对此，我在与他十年共事的亲密接触中感受颇深，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92年初，我被学校派往中文系接替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张正权同志的职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但清华的干部有“双肩挑”的传统，作为一个系的负责人仅有职务而无业务难以立足。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教学任务，成了我面临的首要问题。经与葆耕商量，根据我在校机关从事文字秘书工作20年所积累的应用写作的实践经验和为职员培训讲授此类课程的教学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在系里开设了“应用写作”课。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和全校的选修课，我担任此项教学任务一直到退休，且教学效果良好，曾获校级教学优秀成果奖。退休后，我经常应邀为中央多个部委和大型国企的干部培训班作“公文写作”的专题讲座，并广受欢迎，算是“小有名气”，这一切都是与葆耕当初的支持分不开的。

中文系复建后，由于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有了学费收入按比例提成的固定财源，且系小人少，故人均创收和奖金，一

□ 师友情

度跻身全校各系前列。随着学汉语的外国学生逐年增加，系的财力也逐渐增强。我和葆耕不约而同地想到，除按规定上交校院外，再为校院作点贡献。其中包括向校图书馆捐赠30万元购文科书籍；出资设立面向全校学生的“朱自清文学奖”和面向校院机关的“张正权敬业奖”。因我俩曾在校机关工作多年，深知校院机关工作人员的清苦，且本系各方面工作长年得到他们的支持，故决定专门为学校和本院系机关工作人员设立一笔奖金，每年10个名额，每人1000元，钱虽不多但在当时还算拿得出手。葆耕提议将此项奖金命名为“张正权敬业奖”，意在弘扬张正权突出的敬业精神。

葆耕待人一向坦诚友善，对系里同事关爱有加。他在《告别书》中说：“在这13年里，我把为中文系每一位教师解决他们的困难视为己任”，“对于外面调来的同志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协助解决，使他们感受到清华的温暖，安心地在第一线工作”，事实确是如此。特别是有的同志突遭不幸时，他更是关怀备至。比如，张正权同志病故后，葆耕对其遗孀王大夫非常关心。最初几年，每逢节日系里要增发奖金或实物时，葆耕都要特别叮嘱：“别忘了给王大夫一份”，并亲自或派人到家中看望慰问。又如：1999年春，我爱人查出肺癌（已是晚期），他除了特批我多花时间去医院照看外，还主动提出由系里出笔钱给予补助。我俩还商定，从此例始，以后系里凡有人或直系亲属患了癌症也照此办理。是年9月24日，是中秋节也是我的生日，当天我在医院陪床。没想到下午2时许，葆耕却偕同副系

主任孙宝寅和王小宁老师来到医院，还买了蛋糕，既慰问我的爱人又给我过生日。当时，葆耕对趴在床边的我爱人（因癌细胞扩散至心包，已无法躺着睡觉）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一起给殷望过生日好吗？”但她已无力抬头说话，只能满含泪水地点了点头，第三天凌晨她就猝然离去。再如，四年前系里老职员李宝善被查出肝癌，葆耕从外地回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托人捎去1000元慰问金，后来我们又一起到西三旗登门探慰，并一起商量为他向院系争取补助。葆耕的这些关爱之举，发自内心，自然亲切，反映了他一贯善待他人、乐于助人的为人品性。

葆耕在关爱他人的同时，对于关爱过自己的人更是满怀感恩之心。他在《告别书》中对22位亲密的同事和挚友说：“我即将离开人世。此时此刻，满脑子都是你们的影子。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些许温暖的话，一半是家人给我的，另一半则拜承你们所赐。”接着，他对在逆境中“义无反顾地向我伸出了援手”的三位领导和朋友，对携手创作电影《邻居》的两位合作者，“对中文系和我本人都给过许多关心和指导”的三位老先生，对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中的几位同事和知己，以及在中文系对自己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多位教师，都分别表示了感谢。

同时，他又是一个“待人宽厚，心无芥蒂”之人，对他的这一自我评价我非常认同。毋庸讳言，葆耕在十余年系主任的职位上，不同时期出于不同原因，也有个别的程度不同的对他“不满者”。在和葆耕共事的经历中，我感到他一贯注重集思广益，善于并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也勇于

自我批评，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领导者。据我所知，对他的不满主要是由误解而生偏见。比如因职称问题未解决而迁怪于他等。特别是“不满者”往往又是他曾颇为器重的人，对此他常感困惑和无奈。有时明明受了委曲，也只是一笑了之，不愿做过多解释。后来，由于严重失聪，偶尔听说有人对他发泄不满，也就更不在意了。他曾对我自嘲地说：“谁爱骂就骂，反正我也听不见了！”

其三，葆耕是一位极有才华又极其勤奋、思想敏锐深刻且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他在文学创作、教学科研、办系思路上的实践和成果，就是鲜明的体现。

葆耕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把一辈子交给了母校，并在她的怀抱里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乐年华。略有不同的是，他比多数的“土生土长”者（如我等），既多了一些磨难也多了一些辉煌。特别是十年“文革”他四次挨整，屡遭厄运，跌入生命的低谷，但也在逆境中比一般人对世事和人生有了更深的领悟。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葆耕终于时来运转，长期被压抑的人性情感和长期积淀的中外文化知识的底蕴所汇成的智力优势也终于一朝喷发，并在诸多方面开花结果。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上世纪80年代撰写了《邻居》（合作）等五部电影剧本及小说《同窗》，根据《邻居》拍摄的同名电影获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并因文学创作的实绩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表彰；在教学工作方面，他为本系和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共开设了约十来门必修和选修课程，均有上佳的教学效果。特别是“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这门

课，更是连续九年被评为校级一类课，并获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配套教材《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西方文学15讲》具有广泛影响，成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由于教学工作的突出实绩，他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主要致力于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和清华传统特别是“清华精神”和“清华学派”的研究，且特色鲜明，成绩斐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有一系列学术著述出版，除上述两部配套教材外，还有《叩问生命的神性：俄罗斯文学启示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学术精神》、学术性随笔《紫色清华》以及《电影讲稿》等，还编纂有《清华文丛》、《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瑞恰慈：科学与诗》等；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他当了十余年中文系系主任并兼任过主管科研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新闻传播系代主任、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等职，既为探索“以文为主，文理结合”的办系新路并进而实现“入主流，创一流”的目标而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又为整个学校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尽心尽力，贡献良多。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葆耕能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取得不同方面的建树和成就，除天赋才华之外，主要靠的是“勤奋”二字。葆耕的生命经常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状态，他没有节假日，除了读书写书外，时间都用在工作、研究和写作上。到外地出差开会，也从不参加邀请方组织的旅游活动。2003年退休后，他又到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工作两年，后因耳聋

□ 师友情

无法上课就闭门写作，基本上每年写一本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个月亮 半个太阳》和献给母校百岁大寿的学术专著《清华精神生态史》，是他一生最后的两部著作，也是他一生勤奋和心血最后的结晶。

葆耕的作品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内涵深刻，具有可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感召力和说服力有机融合的鲜明特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中起，他承担着中文系复建和崛起的重任。他说：“为了做好这件事，我开始研究清华人文学科的历史，探索陈寅恪、吴宓、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的心灵世界”，由此探求清华人文传统中“清华精神”和“清华学派”的特点与真谛，并结合清华大学要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作综合性、比较性研究，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概括的“清华精神”的三个特点（一是耻不如人，二是讲究科学，三是重视实干）和一个比较突出的弱点（即“形而上与战略思维的贫乏”）；他阐述的“清华学派”在中西文化“会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学术特点和主要贡献；他提出的“行胜于言”加上韩愈所说的“行成于思”，“这八个字揭示了思（思想）、行（实践）、言（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清华大学的大学理念”；他指出的“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他所“担忧”的：“广大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民族尊严意识的淡化。这种淡化趋势发展下去，不仅是清华优良传统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以及他所提出的见解：“回顾清华大学九十年的历史，虽然学术巨人和科

学巨人林立，但对本世纪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甚少”，“清华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能否为中国和世界提供卓越的思想巨人，是清华能否成为一流著名大学的关键所在”，等等。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见解，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虽有人“未敢苟同”，但确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共鸣。我认为，葆耕的学术研究显现出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特色，对清华的当前建设和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葆耕恪守“文贵创新”的古训，他的作品从不人云亦云；同样，在办系的过程中他也力求开拓创新，积极探索一条“以文为主，文理结合”的新路。1994年，中文系首办本科班（文四班），当时借鉴从1985年开始创办的“工学士+文学士”的“二学位”人才培养的比较成功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首先，这个班学生全部从理工科类考生中招收，他们入学的平均分在全校24个系中排名第12位，新生的质量不错；其次，在本科专业中首设计算语言学方向；再次，在课程设置上，要求学生打好“三个基础”：即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科学技术（含计算机）基础和外语基础。其中科技类课程包括数学、物理、物理实验、现代生物学导论以及计算机类课程（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等），以学分计约占全部学分的20%。经过四年的培养，这个班的16名学生形成了“文理结合”的知识结构，每个学生的学分都超过了教学计划的要求，全班学习成绩平均为83.86分，外语全部通过6级，并

被评为校级“学风优良班”。事实说明，这个班的教学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作为一名开拓者，为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走上“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结合，综合创新”的学术发展之路，作了巨大努力和一番探索。

2010年6月16日是端午节，也是葆耕的73岁生日，可惜他未能越过这一“坎”。6月11日，我同宝寅及其夫人、兼斌、自学、小宁相约，并邀葆耕夫人高敦复一道，前往“天寿园”陵园，为长眠于此的葆耕扫墓并提前给他过生日。当天，我并未像通常那样买菊花，而特意买了一束葆耕钟爱的淡紫色小花“勿忘我”，敬献于他的墓前。约在十年前，我曾读过葆耕写的一篇文章《小五爷园里的“勿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列举了清华建校九十周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所涌现的一些“美文”，如诗歌、散

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他认为，“美文只是一些如‘勿忘我’那样的小花，而她却是一所大学文化灵魂的外在标记”，“这些花扎根在清华园的土地上，目睹或经历了九十年的沧桑巨变，却不足以承载过分沉重的政治内涵。她们的价值在另一方面，即点点滴滴地闪着清华人心灵的虹。她们是一些心灵之花，是肺腑之声，其中还有些是用血浇灌出来的。如果你想窥视清华的人文底蕴，也许这些美文比史书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葆耕“作为一个从理工科横跨进文科的闯入者”，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写出如此多的美文，在如我等“弃工从文”者中，堪称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他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张扬，更不自傲，把他和他的作品比喻为紫色小花“勿忘我”，我想他会乐于接受。因此，我献上一束“勿忘我”他也定会笑纳。

求学四年忆宗师

○王伯惠（1944土木）

前年我曾写了一篇与本文题目相同的缅怀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多位教学宗师的文章，在2008年4月份《西南联大简讯》第43期刊载。限于时间和篇幅，还有几位负有行政责任的老师没有写。现在欣逢清华一百周年校庆，谨继续完成，以作纪念。

张泽熙师

泽熙师是土木系当时最年长的教授，1941年夏我复学到土木系二年级

时，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面微黑黄，带一付黑框眼镜，稳重安详，平易近人，是广受同学们尊敬的长者。那时抗战中期，生活困难，尤其昆明，地处大后方唯一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起点，市面繁杂，物价飞涨，众多学生尤其沦陷区来的学生都要靠教育部发的助学金生活。当时工学院有生活指导委员会，由泽熙师任主任，学生申请助学金，皆须他签字。我虽然家在四川，但在一个山区贫